

农业文化遗产——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贡献中国智慧

龙春林 何思源

坚持“两创”
书写史诗

新征程 新辉煌

核心阅读

今天,在中国广大的农牧区,在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在传统农耕生态系统中,在看似平淡无奇的农田和牧场,到处都有守护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动人篇章。

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到,先民的智慧在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同时,也在持续地贡献于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修复。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我国广大农牧区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实践案例,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型代表,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

管理发展,也让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地区所富有的生态价值成为茶叶的附加值。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牧民们成了生态管护员。长期草原管理与畜牧业生产,让他们积累了草原生态系统的认知和适应自然的技能,成为这片土地天然的守护者,而国家公园的保护目标与保护需求让拥有丰富技能的牧民们有了用武之地。

在贵州从江、云南普洱、浙江青田、江苏兴化、陕西佳县、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甘肃迭部等地,我国19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所在地的生物多样性受到关注。更多的农牧区与自然保护地接壤与交融,人们一直默默守护着他们的家园,守护着那里的生物多样性。

历史上,朱鹮广泛分布在东亚和西伯利亚地区,其野外种群曾一度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1981年5月,仅在陕西省洋县发现7只野生朱鹮。朱鹮对生活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经过我国多方面的努力,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开展人工繁育、恢复栖息地等工作,现在朱鹮的种群

数量已达到9000余只。曾经濒危的朱鹮得以保护,关键在于栖息地得以恢复。在“朱鹮之乡”,数代人对自然家园悉心守护,他们不在农田中使用农药化肥,也禁止一切破坏自然生态的大型工业活动。如今,这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国宝朱鹮成为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金字招牌”,洋县也成为有机产业示范基地。

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加剧,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对生物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生物多样性锐减。为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次缔约方大会于2010年举行,制定2011至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2021年10月,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昆明召开,20个目标中仅有6个部分实现。

前不久闭幕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通过“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在有限的空间和持续的发展需求下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创新保护思路和机制。像洋县这样,在传统生产区域灵活地开展自然保护,实现了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长期成效,让当地居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并享受其惠益,让富有智慧的农田、牧场管理长期有效地实现“在地保护”。这是传统农业系统扩大有效保护范围、填补保护空缺、联通自然保护区网络的潜力所在。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



和谐的美丽家园”。我国广大农牧区保护和利用生物多样性的长期实践案例,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型代表,是中华民族贡献给世界的中国智慧。

▼哈尼梯田药食两用的长苞白球。
龙春林摄



▲涉县梯田的野生药材蝙蝠葛。
龙春林摄

图①:从江芭沙禾晾。
图②:加榜梯田。

梁全康摄
张成武摄
制图:蔡华伟



我们这样守护大足石刻

——一位“文物医生”的自述

陈卉丽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文物医生”,我从业已经27年,“医治”过不少文物“患者”。其中有一名“重症患者”,就是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

800多年的风雨沧桑,让这尊造像伤痕累累,凭借肉眼就可以看见岩体风化,手指残缺、断裂,金箔开裂、起翘,彩绘脱落、起甲,等等,共有34种病害。2008年,国家文物局将造像的抢救性保护工程列为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

我们用了近3年的时间,采用多学科联合的方式,对于千手观音造像进行全面体检。X光探测、红外热成像探测、激光拉曼测样、三维视频显微观察等20多种检测手段齐上阵。在当时,把X光探测等技术用于大型不可移动石质文物修复,在国内尚属首次。

最终,我们制定出治疗方案,历时8年让造像恢复了“健康”。8年间,团队成员每天站在脚手架上,面对冰冷的石壁,嗅着刺鼻的材料味,再热不能吹空调,再冷不能烤火炉,克服了

冻疮、蚊虫叮咬、化学试剂过敏等折磨,科学、严谨、精细地从事着修复工作。

这个工程,成为大足石刻科技保护的标志性成果。

过去,文物保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够系统、科学。对文物表面的病害,我们可以通过“望闻问切”的方式大致了解,但文物有没有“内伤”,原先只能凭借经验判断。科技的发展,让我们对文物病害的诊断和治疗更加精准。在实施修复前,我们还可以借助3D打印技术,开展文物虚拟修复,优化治疗方案。在修复过程中,科技更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利用激光清洗技术治疗文物表面霉斑、水渍等“皮肤病”。此外,我们还利用监测预警系统,实时监测文物保存状况,统一管理文物的各类信息档案数据,实现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的转变。

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文物保护工作仍面临许多挑战。

原先简单的“病情”已经治疗了,留下的都是“硬骨头”,文物病害叠加,治理难度加大,这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今后的工作中,还需进一步加大科技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中的支撑作用。

大足石刻有5万余尊造像,如今已经进入高速风化期。建设文物保护人才队伍刻不容缓,要留得住“练得好功夫,耐得住寂寞”的年轻人,实现精神与技术的“传帮带”。做我们这一行,除了要有专业技能,还需要有超强的耐心、高度的责任心和坚强的毅力。文物保护事业需要一代代人接续奋斗,需要更多的年轻人成为文物守护者。

我们在文物保护事业上取得的成绩,赢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大足石刻的“朋友圈”也在不断扩大。近年来,大足石刻研究院与欧亚等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开展了广泛交流合作。在交流中,大家互相借鉴各自好的经验做法,这也开拓了基层文物工作者的视野。

位于黄土高原的南佐都邑性遗址

韩建业

甘肃庆阳西峰郊区的南佐遗址,位于黄土高原第一大原董志塬。这里黄土厚达200多米,适宜农耕,是传说中黄帝部族的活动地域,也是周人祖先教民稼穡、休养生息之地。在此次考古之前,我们很难想象到,董志塬上会有一座远早于不甯时期的都邑性聚落遗址。

南佐遗址早在1958年就被发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有两个阶段的6次发掘,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一座占地面积800多平方米的大型宫殿式建筑。该建筑夯土墙宽约1.5米,残存高度2米以上,前厅有3排柱洞,大堂有一座直径3.2米的大型火坛、两个直径1.5米的大柱。建筑周围一二百米的位置,呈倒“U”字形对称分布着9座大型夯土台,有些至今还残存三四米的高度,俗称“九女馆花台”。

这样一座大型宫殿式建筑为什么会出现在黄土高原上?“九台”到底是什么时候的遗迹,和宫殿式建筑有何关系?遗址的总体范围和结构布局如何?我们就是带着这些疑问进驻南佐,从2021年开始了第三阶段的考古工作。

经过近两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我们发现,在主殿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夯土墙侧室,每间侧室有数十平方米,墙残高也是2米多,地面和墙壁都涂抹白灰面。在东西侧室之外的东、南、西面都有厚约1.5米的夯土墙,如果下一步北侧也发掘出夯土墙,那就会围成一个数千平方米大小的长方形宫城。宫城南墙有内外两重,内墙门道和主殿中门相对,构成宫城的中轴线。宫城外还有宽约15米、深约10米的两侧壁有夯土防护的壕沟。

令人惊讶的是,主殿、侧室等在某个时间点几乎同时停止使用,所有宫城空间在短时期内以夯土填充,这样就形成了一块数千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台基结构,以便在上面营造新的建筑。这也正是南佐夯土墙建筑保存良好的主要原因。

我们可将南佐宫城分成两个时期,第一期的主殿、侧室等,测年约在距今5100年,第二期夯土台基并营建新建筑的年代约在距今4800年。从出土陶器来看,两个阶段都属于仰韶文化晚期。

宫城正好位于“九台”的北部中心。“九台”每个台大约40米见方,每个外侧有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壕沟,“九台”及其壕沟所包围的遗址核心区范围约30万平方米。壕沟的两侧甚至底部有几米厚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自然黄土沟壁的破坏,这种深槽状结构前所未见。壕沟紧贴夯土台底部边缘修建,与夯土台属于同一时代,发现的陶片都属于仰韶文化晚期,测年也在距今5000年左右。推测很可能是利用壕沟挖出来的土夯筑了“九台”。在“九台”周围一公里多的位置各有一道冲沟,大致围成一个至少600万平方米的长方形的空间,调查勘探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的陶片、白灰面窑洞式建筑、夯土基址、沟渠等。

在宫城东侧的祭祀区,发掘出数百件白色附加堆纹的小罐、成套的带盖彩陶小口平底瓶、白陶、黑陶、涂朱砂的石镞骨镞、绿松石珠,大量家猪和鹿的骨骼,数以百万粒计的碳化稻米。其中的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一件精美的带盖白陶甗最薄的地方仅有一两毫米,黑陶表面有釉质光泽。大量水稻的出土出人意料,有可能为当地种植——现在庆阳有的地方也还种植水稻,但也有可能是从外地征收或者贸易而来。

南佐遗址的发现,让我们思考黄土高原地区的文明形成。约600万平方米的遗址范围、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每个上千平方米的“九台”、数千平方米的宫城、800多平方米的主殿,使南佐成为同时期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中心聚落之一。大体量宫城宫殿建筑、宫城外和“九台”外的巨大夯土护壁环壕,其建造体现出强大的组织管理能力和很高的建筑技术水平。“九台”所围成区域在遗址中心、宫城在九台中心、主殿在宫城中心,主殿中门到宫城南门为宫城中轴线,东西侧室大致对称,构成中心对称、中轴对称、主次分明的复杂的封闭式宫城格局。白陶、黑陶等不仅体现出高超的制作水准,是手工业专门化的结果,而且白陶、黑陶、绿松石、水稻以及陶双腹器、夹炭陶等,都凸显了南佐中心聚落的特殊性。

我们认为,南佐遗址的发现,也许会改变人们对黄河中游尤其是黄土高原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地位的认识。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卧佛病害调查。 陈卉丽供图